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88/77
29 February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
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1988年2月26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致人权副秘书长函

我谨代表我国政府请求将信中所附信件作为人权委员会议程项目 12 下的文件
加以分发。

大使

Joseph Carlton PETRONE

(签名)

附 件

1988年2月

古巴哈瓦那市东哈瓦那监狱

美国代表团

Armando Valladares Perez 大使

第四十四届联合国人权会议

瑞士日内瓦

大使先生：

我们是几个政治犯，即所谓的“在监里生根者”。我们对于自1987年9月15日开始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非常关切。那天，一位葡萄牙记者，

在反谍报人员和监狱官员的陪同下突然来访我们的牢房。我们感到有责任请您注意自从那天以来所发生的种种把戏。

我们想向您禀报下述情况：

(1) 您已知道，我们这群“生根者”被关在东哈瓦那监狱 (Combinado del Este) 1号楼第4牢房北翼。这是内务部最高级官员导演戏剧的场所。在第四十四届人权会议前后专供外宾参观，为我们以前、现在以及将来在铁窗内的生活条件制造一种完全虚假的形象。

(2) 这是自从您所熟知的这个政治监狱成立30多年以来当局第一次允许外国代表团来访问我们，其罪恶目的是为了显示我们的生活条件——仿佛我们一直是这样生活的——希望这些代表团向全世界宣传所得到的假象。

(3) 当局从不允许其他国际代表团来访问我们，例如，阿根廷人权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大赦国际等。

(4) 使我们感到愤怒的是：来访代表中绝大多数明显地只对我们现状感兴趣，丝毫不想了解我们几个月前、或者在同一监狱中其他政治犯的生活条件。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设法使他们听一听我们的证言，向他们诉说在我们搬入当局设置这个“表演区”之前发生的违犯人权情况。（我们有责任、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高兴地着重指出由民主党议员 Bruce Morrison 率领的美国访问小组热情而乐意听取反应的态度。小组所有成员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听我们对当局的谴责，从而了解到我们在监狱的实际情况。）

(5) 同样使我们感到愤怒的是，来访者坚持要将我们目前的环境拍电影摄影。如果我们真地允许他们这样做，就会为这一闹剧提供证据。作为实例，我们想着重叙述下述各种态度：

(A) 一位英国人 Sylvia Stevens 去年 11 月 17 日来访，自我介绍说是伦敦电视台第三频道的“工作人员”。Stevens 小姐宣称，来访目的是为了描述我们的真正处境，用以反驳《迈阿密先驱报》的一篇报导。为此，她要求得到图片证据。我们拒绝同她合作，她很不高兴。当我们建议她去拍摄我们原先长期被关押的监狱的实际状况时，她更为恼火。几个小时后，Stevens 小姐又回来，带了一名“摄影师”。当我们再次拒绝同她合作，不让她拍电影或照片时，她气得跳起来。

(B) 一位巴西人 Amanda Costello 是总部设在意大利米兰的一个国际反酷刑组织的两名主席之一。Costello 小姐在 1987 年 9 月 18 日访问期间录制了我们提供的证据。1988 年 1 月 27 日第二次来访时，她承认她仍未发表我们的证词，并且，象第一次访问时一样，坚持认为，如无照片，我们的话就没有价值。这两次，她都只看我们的容貌不关心我们的健康。这使我们极为不满。她临走时宣称：“只有让我拍照，我才会回来”。

- (c) 最近来访者是一位爱尔兰籍的欧洲议会议员Mary Benotti 和几种欧洲报章杂志——伦敦《卫报》、里斯本《快报》、《爱尔兰时报》——驻古巴记者。 Evelyn Geldoff 她们两人对与各种政治犯谈话很感兴趣，特别是71岁的Juan A. Berto Valdis Teran 。 她们，在我们这儿呆了一会，问了一些问题，录制了我们提供的证明。 然后，在内务部官员的一再催促下离开我们这里，朝 Pinal 方向到另一座大楼，在接待室与Valdis Teran 继续交谈。

她们在与我们隔离之下采访，被国家安全部门用音响和录像设备监视。 采访结束后，Valdes Teran 认为来访者态度和蔼、平易可亲，不愿使她们扫兴，因此同意给她们翻译二首歌，并让她们拍照。

- (d) 我们绝对肯定，内务部的领导遵照更高一层的命令，制定了一贯策略，安排一切可能的机会，将我们放在这个专门设计的环境内外拍摄电影和照片，其目的就是为了冲淡或诋毁关于古巴政治犯以往30多年受尽苦难、最基本人权不断被侵犯的报导。 这一策略包括：

- (一 a) 有时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由专家在医院为病残人治病。例如，将一个需要矫形术的病人从古巴送往东德。 我们多数人都需要穿矫形鞋。 过去，在当局批准下（这种情况少得屈指可数），有关的治疗人员曾到监狱来服务。 现在，我们听说，我们必须自己到矫形中心去。为治疗人员不再到监狱来了。 我们多数人都需要治疗。 这种治疗只有那些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医院才能提供近日的院中待遇令我们感到吃惊，也提高了我们的警惕。 以往，除在少有的情况下，从不允许我们享受这种人应有的根本权利，从不允许我们得到所需的治疗。

狱方现将运送我们去医院的车停在著目的地点。

到医院后，院方为我们提供冷饮，仿佛内务部将此作为其义务；

官方一再坚持要我们穿便服，不再象以前那样穿睡衣式的囚服。但同时，他们又拒绝给予我们政治犯应有的常穿便服的权利。

(一 b) 放我们有些人回家看望由于残疾或其他原因不能前来探狱的亲属。过去，即使是父母或子女病重或死亡，也没有回家的可能。我们想说明，由于“对话精神”的结果，有时候在关键时刻会将犯人带走去探望病重的家属，或者在死者身旁守几分钟。

(二) 为了宣扬我们的居住地方，狱官将照相设备暗藏在公文包、用具、衣服中。千方百计用电影摄录我们。这种隐蔽活动在二月份达到高潮。有一天，几日前刚开始在我们这里工作的 Raul Rodriguez 上尉在平时随身公文包中带来一架照相机，走向负责我们这区监房的 Montarro 中尉。我们有一位同伴清楚地看见 Rodriguez 上尉将照相机对准一名犯人，这名犯人当时在听一名士兵示范手提收音机麦克风的功能（收音机也属于该上尉）。同一天，有几个士兵在监狱屋顶对我们在院里的几个人拍照或试图拍照。我们就这些事向 Manuel Sanchez 少校提出抗议，他是狱中负责政治犯的副主任。他没有否认这些事实，但向我们保证不再出现类似情况。当时在场的 Montarro 中尉承认，Rodriguez 上尉曾做过一些他不了解的“奇怪动作”，假装不知道我们已看穿了他们的秘密活动。

我们疑惧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了种种手法，这似乎与 1979 年的那场闹剧相似。当时正在开展所谓的“对话”，作为释放政治犯的年份。现在无法知道的是，其他人的处境怎么样，我们可怕的真实现实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引起世界舆论的注意。

在这种当局设计的“剧院”中拍摄的电影和图片一旦公布，就会为日内瓦会议或任何其他会议为我们这批“生根者”造成一种假象。因此，我们绝对拒绝为镜头表演。

我们相信，本文件将会有助于您以及您光荣地领导的代表团揭露卡斯特罗代表团在第四十四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用内务部备制的电影和照片对我们实际情况所作的假宣传。

我们认为您才是我们真正的兄弟情谊的代表。我们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巴“监狱生根者”政治主席团的成员。

“世界上真理是要揭露的，不会被隐瞒的。”

Jose Marti

古巴 哈瓦那市 东哈瓦那监狱

XX XX XX XX XX